

關於組織中央政府

周佛海

上海中華日報館印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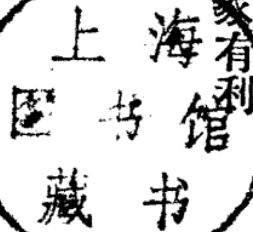
上海图书馆藏书

A standard linear barcode is positioned horizontally. Below it, the numbers "A541 212 0022 37148" are printed vertically, corresponding to the barcode's data.

A541 212 0022 37148

關於組織中央政府

一般傳聞，先說中央政府，定於雙十節成立；以後又說十一月十二日，總理誕辰，一定實現；現在又說明年一月一日，必可成功。但是雙十節過去了，總理誕辰也過去，中央政府並沒有成立。現在，一月一日，也漸漸的快到了，中央政府的成立，還沒有一些動靜。於是種種的懷疑和揣測，到處都可以聽得見。大家都以為汪先生組織中央政府的計劃，終於失敗了。汪先生的和平運動，不能成功了。於是反對和平的人，就幸災樂禍的歡欣鼓舞；贊成和平的人，也就垂頭喪氣的悲觀絕望。汪先生的組府計劃，真的失敗了嗎？汪先生的和平運動真的不能成功嗎？組府計劃，就是這次運動的最後目的嗎？組織中央政府，於國家有利



1511763

嗎？這些問題，都有研究清楚的必要。現在特一述個人的所見。

二

汪先生這次所領導的運動，當然不是以組織中央政府的本身爲目的的。組織中央政府，不過是和平運動的一個過程，不過是救國的一種方法。組織政府的本身，決不是目的。如果汪先生祇是以組織政府爲目的，而不顧及國家的利益，老實說，我們早已上了檯了，那裏能等到今天。在任人家的揣測和懷疑？我們也會聽見許多故意捏造的謠言；有些說，因爲旣成政權的反對，所以汪先生不能上檯；有些說，因爲日本的不同意，所以中政府不能實現。但是我們敢放肆的說，果我們只是爲取得政權而組織中央政府，換句話，果我們只是爲取得政權而組織中央政府，再說得露骨一點，如果我們只是爲個人權利祿位而組織中央政府，我們犯不着這樣的慘淡經營，艱難繕造，老早已加入旣成之局，樹立起中央政權了。我們堅決的主張和立場，乃是：

如果中央政府的樹立，於國家沒有利益，我們情願終生亡命，決不冒冒失失的隨便上檯；但是反過來說，如果於國有利，我們是不避艱險，不辭危難，要挺起身來，擔負這個責任的。外面所傳雙十節，總理誕辰，以及明年元旦，都不過是揣測之詞。實際上並沒有這種決定。我十月間赴東京的時候，日本各方面都以中央政府成立的時期問我，我答覆他們說：『中央政府的成立，不是時間的問題，乃是條件的問題。如果條件足以救國，我們就立即着手組織。否則，我們是永遠不會組織的。』我告訴日本友人的這幾句話，現在再拿來告訴我們的同胞。這乃是汪先生的主張，這乃是我們的立場。

我們先來檢閱組織中央政府，是否於國有利。

有些人說，你們的和平運動，我們是同情的。但是爲什麼要組織中央政府？重慶政府，既然不能消滅，你們再來一個中央政

府，不是要把中國變成一年以前的西班牙嗎？不是要把外戰變成內亂嗎？不是上了日本人以華制華的當嗎？這些話驟聽起來，似乎有理，其實不然。如果，抗戰的前途，確能得到最後勝利，我們是不應該組織中央政府的。如果重慶當局，能够開始停戰，和平的交涉，（第三國調解或直接交涉，暫置不論。）我們的中央政府，也不應該樹立的。但是最後勝利，是絲毫沒有把握的。這個道理，我在『回顧與前瞻』和『中國國民黨過去的功罪和今後的地位』兩文中，已經說得很詳細了。一個國民，那裏有不情願，不希望自己的國家打勝仗的呢？但是事實究竟是事實，希望是不能變更事實的。重慶講和，現在也是不可能的。如果說蔣先生祇顧私人的權位，完全不顧國家的利益，我還不相信的。如果说他不明白和戰的利害，我是更不相信的。但是他的地位，他的環境，不容許他講和。所以他唱出要日本先撤兵，然後再講和的

一種連他自己暗中都要好笑的超常識的議論。翻閱從古到今的中外的和戰的歷史，都是先停戰，再議和，然後再撤兵的。從沒看見先從撤兵做起，最後纔做到停戰的。如果日本真的於停戰議和之前先撤了兵，那豈不是中國打了勝仗嗎？還要什麼和平交涉呢？重慶既然在這種超常識的空氣之下，那裏還準備議和呢？重慶既然沒有勝利的把握，又沒有議和的準備，我們就不能眼看着中國就這樣淪亡下去，而不組織中央政府來擔負這個和平的使命了。

我們深信組織中央政府，擔負和平的使命，於國家是『有利』的，最少的限度，確實是『無害』。

爲甚麼說有利？因爲由汪先生所領導的中央政府來議和，可以得到較好的條件。我們當然知道國與國之間的關係，要憑利害，是不能以對人的好惡爲轉移的。但是人類總是感情的動物。感

情的作用，並非完全不能影響國與國之間關係。汪先生這次犧牲一切，挺身出來，爲中國挽救危亡，同時爲日本解決困難，這種偉大的精神，是可以使日本人感動。我兩次到東京和半年來和日本友人接觸的結果，深知汪先生的和平運動，對於日本精神的影響，實在很大。日本民族，是富於感激性的，這是日本民族性的優點，我們應該認識的。他們既然是富於感激性的，所以他們以爲中國，爲日本，爲東亞，不顧生死，出而主張和平的汪先生爲對手來議和，和以與他們惡戰苦鬥了兩年以上的重慶政府爲對手來講和，心理上，情緒上，是完全不同的。因爲有這個不同，所以他們對於重慶政府所要求的必多，對於新中央政府所要求的必較少。這從日本民族的特性來看，一定是不會錯的。這還是從理論來說。根據我的體驗，事實也是如此的。我是奉命任外交折衝的。我以前雖然沒有辦外交的經驗，但是我深感覺這次我們和日

本折衝，和普通的外交，完全不同。普通的外交，是只替自己打算，不爲對方想的。這次的折衝，固然雙方都爲自己的國家打算，但是同時雙方都互相爲對方設想。我在交涉之初，就對日本同志表示，我們此次交涉，雙方都要有種特殊精神。就是日本不能以戰勝國自居，中國不能不以戰敗國自處。如果日本站在戰勝國的地位，自己爲刀鋸，而以中國爲魚肉，我們是受不了的。如果我們受不了，和平是沒有希望的。同時，中國也不要忘記喪了許多師，失了許多地，實際上是打敗了仗的。如果打敗了仗，還一點點虧都不肯吃，和平也是沒有希望的。日本不要以戰勝國自居，就是不要向中國要得太多，不要使中國吃虧太大。中國不能不以戰敗國自處，就是不能不多少送給日本一點，不能不多少吃一點虧。如果日本能以軍事力量，完全滅亡中國，或者中國能够以軍事力量，把日本軍隊驅出中國，那乃是另一問題。如果

兩者都不可能，上述的精神，中日雙方，都要具有，然後和平纔能成功，纔能永久的。我們的折衝，便是根據這種精神。以日本向我們要求的時候，他們常常爲我們設想，如果我們接受了這個條件，新中央政府是不是還站得住，是不是還可以見諒於國人。我們拒絕日本的要求的時候，我們也常常爲他們設想，如果連這一點我們都不答應，日本的國民，是不是會反對他們的政府，是不是要使他們發生內政問題。像這樣一方面爲自國打算，同時互相爲對方設想的精神，假使東京和重慶講和，一定是不會有的。如果沒有這樣的精神，講和的條件，一定要比較苛刻，中國的損失，一定要較多較大。因爲一個是以友好的精神來交涉，想從這個交涉之中，得到公平的和平，一個是以怨恨的精神來交涉，想以交涉的條件作報復的手段。這個區別很重要，只要是冷靜觀察的人，一定可以認識的。

我們因為以上述友好的精神來折衝，所以雖然常常也逢着難關，遇着暗礁，但是都不是沒有方法去解決的。現在雖然還沒有達到最後決定的階段，但是就交涉經過的大體說，雖然還不能令我們十分滿意，但是恐怕不是重慶政府交涉時所能得到的。日本雖然略有所得，中國雖然準備略有失，但是中國所準備的失，決不致妨礙中國的生存，獨立，和自由的。談判的條件，雖然在最近的將來，還不便全部公佈，但是我可以負責的保證，除非中國真正得到最後勝利，就是重慶來講和，至多也不過只能得到這樣的條件，恐怕連這樣的條件也得不到。這決不是欺人之談，我們對於歷史，要有交代的。我們不是喪心病狂，難道願意天下後世的人，爲我們鑄鐵像嗎？

我相信一定有人說，條件雖然很好，但是等到你們上檻之後，有甚麼方法，保證日本有誠意，有什麼力量保證日本能實行？

這個顧慮，當然是應有而必有的。不過我覺得這也不是毫無把握，至少比最勝利的把握要多得多。

據我半年來實際的體驗，我覺得至少日本的當局和在野有識之士，是有誠意的。別的不說，就是就這次條件的會談來說，也是一個證明。前面已經說過，這次會談，是以友好的精神來會商的。但是雙方關於利害所繫，得失，關的一方，爭執依然猛烈。雖然爭到最後，雙方都以友好的精神，尋覓公平的解決。但是爭執的時候，雙方都絲毫不肯放緩，因此要就擱了許多時間。我就是從日本爭執得狠厲害之中，看出日本將來能够實行的誠意。這個理由很簡單，就是：本來預備不實行的事情，何必費氣力去爭？反過來說，就是因為將來不能不實行，所以現在不能不認真的爭。就日本現在的情形來看，是希望中國的中央政府早日成立的。如果他們沒有誠意，儘管我們現在要甚麼，他們答應甚麼，我

們怎樣說怎樣好，把我們早點騙上檯。等我們上了檯，他們再來變臉。這樣做法，有何不可？但是他們現在並不如此。因為雙方都狠認真，所以就不能不多要時間，因為多要時間，他們希望早日成立的中央政府，就不能不因此延遲下去。他們一方面希望中央政府早日成立，一方面條件又要認真商討。因為要認真的商討條件，寧肯讓切望早日成立的中國中央政府延遲。可見得這次所談的條件，他們是準備將來實行的，決不是現在拿來騙我們上檯的把戲。

我覺得我們不應該根本懷疑日本完全沒有誠意。如果要根本懷疑，只好一直打下，永久不來講和。如果終有一天要講和的話，我們便一方面不要使人家曉得我們的誠意，同時我們也不要懷疑人家決無誠意。至於說由新中央政府來講和，恐怕日本人沒有誠意，難道由重慶政府來講和，日本便立即變成有誠意嗎？我

我們決不是和重慶政府，爭着講和，如果重慶政府能够講和，乃是我們馨香禱祝，求之不得的事情。我現在只說，如果根本懷疑日本完全沒有誠意，那末，只好一直打到底，新中央來議和，他們固然沒有誠意，重慶來議和，他們也決不會有誠意的。如果日本有誠意，那末，在重慶不肯議和的現在，新中央政府來和日本議和，我們何必多顧慮，多懷疑？固然，我對於日本將來實行條件，不是絕對樂觀的。我前面說過，日本當局和有識之士，是有誠意的。但是日本除却上級當局之外，還有各級人員；除却有識之士外，不明白的人還多。將來執行條件，全在他們。他們有無誠意，我現在不能確實的答覆。如果他們沒有誠意，將來履行條件，是要遇着許多難關或阻礙的。至少一定會使人感覺得不痛快。不過只要他們的高級當局有誠意，一定可以督促他們中下級人員去實行；只要有識之士有誠意，一定可以教育一般不明白的人民。

使他們明白。所以關於這一點，我也不是絕對悲觀的。自從甲午戰爭以後幾十年的亂世，要一筆來勾銷，真是談何容易。這種劃時代的歷史事業，不是一件簡單的事，當然有許多困難，要我們去克服，有許多障礙，要我們去突破的，那裏能够看見前面的險阻艱難，便望而却步呢？

再說我們有什麼力量，保障他們履行條件。抗戰如果能得最後勝利，那是另一問題。我現在要問假使重慶來議和，會有什麼力量來保障。我想不外兩種：第一，是托英美…來調停，用國際力量來保障；第二，整理和充實軍備，用軍事力量來保障。這兩種保障，都是靠不住的。國際的力量如果有用，國聯歷屆關於中日關係的決議，老早應該發生效用了；九國公約老早應該把中國救起來了。如果要用國際的力量，來保障日本履行條件，不是欺人，便是自欺。三國干涉還遼的事，是不能重見於今日的。軍事

力量，也够不上保障。拿軍事力量來保障，不外說日本如不履行條件，我們再來打一仗。現在因為打敗了仗，纔來講和。如果再打一仗，還是要打敗仗。如果日本沒有誠意履行條約，當然他們也是不惜再戰，不怕再戰的。所以以為只要我們有了軍事力量，便不怕日本沒有誠意，便可保障條約的履行，那也是靠不住的。

然則我們一點都沒有保障嗎？我覺得我們所有的保障的力量，超過國際的援助，還勝於百萬大軍。這個力量，便是精神的力量，便是決心。

汪先生所領導的同志，是不計個人的利害得失的，是以國家的利害為轉移的。如果上檻之後，日本不能履行條件，我們會全部撤退的。『條件不履行，我們就不幹』。這乃是我們的決心，這乃是我們的保障。『這保障的力量，是非常偉大而雄厚的。有人說，你們上檻之後，恐怕就想不幹也不可得。這話我不相信。

幹的自由，也許不充分，不幹的自由，我們是充分有的。固然，在沒有撤兵之前，我們是在日本的勢力範圍內的，但是我們只要有不怕死的決心，我們是充分有着不幹的自由的。最大的限度，也不過把汪先生以下的同志，全部提去殺死。如果我們怕死，我們也就不會離開重慶了。老實說，我們這般革命黨徒，都是窮光蛋出身，決沒有患失的觀念。我們都是劫後餘生，雖不敢說視死如歸，至少人家不能以死、威脅或挾的。所以如果日本不履行條件，我們是決心拂袖而去的。這個決心，汪先生和他的幹部，都是狠堅強的。我相信日本決不會這樣沒有誠意。萬一如此，我們便自認瞎眼，向他們說一聲『撤約拉拿』，叫他們另請高明去合作。日本如果有心有力來滅亡中國，那是另一問題。如果既無此心，更無此力，就不能不和中國合作。要和中國合作，就不能不使中國國民相信日本有誠意，相信日本不是帝國主義。

，相信日本尊重中國的獨立和自由。汪先生和他的同志是拚着生命出來主張中日和平和中日合作的。汪先生和他的同志，是誠心誠意的要實行中日合作的，像這樣具有堅强信念和充分誠意而且拚着生命來爲中日合作而奮鬥的汪先生，日本尙且不能和他推誠合作，以後還有誰相信日本的話，還有誰敢同日本共事？如果到了這個情形，日本怎樣辦？是不是去找一般失意之徒，無聊之輩，來替他們作爪牙，爲他們供驅使？如果這樣，這般人是不是能得國民的信仰，能得國民的擁護。果不能，他們是不是有力量和日本協力，來解決中日的糾紛，來收拾目前的時局？如果不能，日本還有什麼路可走？所以站在日本的立場上說，忠實的履行條件，不僅在道義上應該如此，就是在利害關係上也應該如此。

因此，我深信我們這種精神上的保障，比較百萬大軍的力量要大得多。不論說，將來不如意，不滿快的事，必將很多，我們要不

是今天說不幹，明天說下檯。我們的幹不幹，不是個人出處問題，乃是國家的利害問題。我們不易上檯，同時當然也不會舉妄動的隨便下檯。但是等到我們盡了心，竭了力，忍無可忍，爲無可爲的時候，汪先生是會領導他的同志，勇退的下檯的。

以上是說組織中央政府於國『有利』。就是退一萬步說，至少也於國『無害』。因爲如果組織了中央政府，會使中國比較現在喪失更多，犧牲更大，那當然是有害的。我們姑且不說因爲新中央政府的一生，會使中國喪失較多，犧牲較小，但是絕對不會因此喪失更多，犧牲更鉅。如果喪失和犧牲都不過和現在一樣，新中央政府的成立，那裏會使局面比現在更壞？換句話說，照目前的狀態看，新中央的產生，那裏會於國有害。

如果我們在重慶統治的範圍之內，樹立起中央政府，和共產黨在重慶統治的西北，樹立起西北邊區政府一樣，或者會使局

，比現在更壞，或者足以促成重慶的崩潰。但是我們現在要組織中央政府的地方，是已經丟掉了兩年的地方。我們不在這些地方組織新政權，不會使抗戰勝利；同時也不會因為我們在這些地方組織新政權，就會使抗戰失敗。抗戰的失敗，抗戰之得不到最後勝利，另有其他的原因，和我們組織中央政府，沒有甚麼深刻而密切的關係。不待說，將來中央政府成立之後，是有許多人民和軍隊來歸的。表面上這似平是撤重慶的台。但是這乃是人心思和將士厭戰的表現。這種根本的精神的原因，會使軍隊和人民，傾心於新中央政府的。如果蔑視了這種一般的心理，而歸咎於新中央政府的組織，那便是抹煞事實的議論。因為如果人民不思和，將士不厭戰，新中央政府，是不能取得一般的同情的。然則現在這樣事實和心理的狀態之下，組織中央政府，於國家有甚麼害處？

再從對外的關係來說。我前面說過，這次調整中日關係，我們是不能不多少吃點虧的。但是我們進一步來研究，事實上，我們是送東西出去，還是收東西回來？老實說，我們是收東西回來的。固然，這些東西，原來是我們的，但是現在已在人家手中了。如果我們不能以武力把日本軍隊驅出國，這些東西，仍舊在他們手中。我們實在沒有把日本軍隊驅出中國的把握，那末，這些東西，永久就會在他們手中。我們現在却要從他們手中，把這些東西拿回來。雖然在事實上，沒有全部拿回來的可能，但是總是要努力越多拿回越好。所以與其說我們送掉多少，不如說我們拿回多少。我們假定今後不能因為中央政府的成立，而拿回一些東西，但是至少決不會因為中央政府的成立，比現在還要更送得多。因為東西本來已在人家的手中了。我們是一無所有，沒有東西可送。所以中央政府的成立，即使於國無益，那裏會於國有

害？最大的限度，也不過和現在一樣！

我們不是以國事爲兒戲的。我們曾經再四考慮組織中央政府的得失利害。我們深覺組織中央政府，是必有所得，是必然有利。最低的限度，也是萬無所失，必然無害。不戰不和的局面，是沒有生路，只有死路的。我們組織中央政府來調整中日關係，是從死路之中，打開一條生路。如果這條生路打通，我們就可以達到生的目的。萬一此路不通，至多也不過仍舊死而已矣，決不會在死之上，再加一層死。本來也就要死的，如今也不過一死而已。我們深思熟慮的研究了利害得失之後，纔決心準備組織中央政府。我們沒有喪心病狂，那裏願意犧牲國家的利益，來爭權利，逞意氣！

中央政府成立之後，兩個政府的對立，一個時候是難免的。但是如果我們所得的條件，不妨碍中國的生存，獨立和自由，而

這些條件又能逐步的切實實行，我們抗戰的目標就已達到，抗戰的原因，就已消滅。抗戰的原因，既然消滅，誰還願意去打無意義的仗，誰還願意去爲無謂的犧牲？小待說，在短時期內，因爲重慶方面的言論統制和暴力壓迫，人民不能認識事實，不能了解真相，不敢發表真正的主張，不敢採取正當的行動。但是過了相當的時期，等到人民了解了真相之後，他們的輿情，無形中是會逼着重慶政府和中央政府合併，使中國統一的。我是從重慶出來的。我深知除掉極少數的人員外，大多數軍政當局，誰不希望和平。他們所顧慮的是條件太苛刻，日本靠不住。這種顧慮，只要是愛國的中國人，當然是應該有的。如果以事實來表現條件不苛刻，日本有誠意，誰不願意中國的統一。至於汪先生所領導的同志，當然不會因爲個人的祿位和權利，而不歡迎兩個政府的統一的。現在聽說有些人埋怨汪先生的門關得緊，甚至說他的左右

，尤其是鄙人包圍先生，閉塞賢路。這種推測，真是太無價值。我們認爲參加和平運動，主張中日合作，乃是義務，乃是責任，決不是權利。這種神聖的義務和偉大的責任，當然歡迎許多人來負擔，那裏是少數人所能完成。所以重慶方面，只要是和我們主張相同的人，我們是極端歡迎的。民國十六年，有南京和武漢兩個國民政府的對立，民國十九年，也有北平和南京兩個國民政府的併存，後來都統一了。雖然過去是純粹的內政問題，現在參有外交的關係，情形不完全一樣；但是政治的演進，是千變萬化的。半年以前，誰能夢想國社黨和共產黨會合作？但是德蘇居然携手了。國與國之間，苟且如此，同是中國人，難道會永久不化除成見嗎？不過我所希望的，就是不要把政策的異同之爭，變成個人的恩怨之爭。人生數十寒暑耳，一棺付身，萬事皆了，大家爲甚麼不以國家爲重，而流爲個人的意氣之爭。說到這裏，不禁要

說幾句題外的話。我們的特務同志和重慶特務份子的爭鬥，是我們極痛心的事。我們是主張中日和平的。現在和平沒有成功，自己却先互相殘殺起來了。這那裏是我們意的事。這個責任，重慶是要負的。我們沒派一個人到內地去謀殺任何人。但是重慶却派人到河內去暗殺汪先生，派人到香港、上海來暗殺我們的同志。我們的行動，是完全出於自衛的。重慶的這種行動，除却爭意氣以外，我不知道對於大局究竟有甚麼好處？萬一汪先生不幸，就遭暗算，他的同志，只有加紧努力，實現他的主張的，和平運動，決不會絲毫停頓。其他任何人暗殺，更不成問題。所以重慶即使能够暗殺一兩個人，卻逞一時之氣，快一時之意外，於事有甚麼好處？不僅如計，重慶派來暗殺我們的人，都先後參加和平運動，而爲我們的重要幹部了。僅就這一點，也足以促重慶方面的太澈大悟。所以這種個人意氣之爭，實在太無意義，太無

價值。只要大家都以國事爲重，意氣爲輕，我不相信對立的局面，是會永久延長下去的。即使有少數的人，徒逞私人的意氣，在時代的要求和民衆的指摘之下，他們是不會長久存在的。所以我對於中國將來的統一，不僅不絕望，而且不悲觀。這個觀察，不僅根據哲學的推測，而且是根據科學的分析的。

以上把各種懷疑，都加以解釋了。最後說到中央政府，甚麼時候可以成立。中央政府，不如重慶所宣傳，是失敗了；也不像外間所傳聞，是停頓了。既沒有停頓，更沒有失敗。我們正在積極的進行着，就是正在和日本談判條件。前面曾經說過，如果條件不能保證中國的獨立和自由，我們是不會幹的。我們的目的，是要把快陷於萬劫不復之境的中國救起來，如果條件不能使我們達到這個目的，我們何必組織中央政府？難道真的要做漢奸嗎？但是條件是不是能圓滿？我是當交涉之衝的人，我深知雖然還有

兩三個具體問題，雙方意見，還沒有完全一致，但是雙方都是友好的精神來研究，所以意見的漸漸接近，乃至於完全一致，不單是有可能，而且爲期也不遠了。只要條件全部談判完成，中央政府，就可立即組織起來，以担负實行這些條件的神聖使命。

總結的說：組織中央政府，是於國家有利益的。組織中央政府，一定會成功的。組織中央政府，爲期是不遠的。全國的同胞，一致起來擁護新中央政府完成他的神聖使命。



